
生态型郊区存量规划的思考与探索——基于崇明区总体规划的实践

张振广 孙娟 马璇^{*1}

【摘要】：用地“零增长”背景下，存量规划探索已经成为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的主要方向。然而传统规划中对中心城区的存量更新有较多的研究探索，但对于以乡村为主导的郊区存量用地规划鲜有研究。生态型郊区存量规划的价值显现，表现在郊区生态价值被认同、大集中建设模式需转变、广大乡村价值正逐步显现等。因此，结合上海崇明总体规划的实践，从高度认识生态型郊区的基本特征、价值内涵、发展导向入手，评析以乡村为主导的生态型郊区空间发展的主要方向，提出关注生态、乡村、城镇三美空间的全域思路，并结合三类空间重点，明确不同规划导向。同时，重点研究乡村地区的存量活化，提出乡村微更新的规划思路，引导生产、生活、出行方式的生态化转型，希望通过郊区存量规划研究，为资源紧约束背景下特大城市生态型郊区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生态型郊区；存量规划；全域空间；总体规划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363(2017)08—0195—05

DOI: 10. 16361 / j. upf. 201708028

1 存量规划研究综述

近年来，存量规划越来越成为关注重点，几大城市在总体规划层面率先提出了由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的发展导向。2007年，深圳总规提出规划的重点“转向存量资源的优化和既定空间利益关系的调适”，成为我国第一个提出从增量为主转向存量为主的规划；2014年，上海启动新一轮总规的编制，明确“总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优化、流量增效、质量提高”的土地利用空间管理政策，并提出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的规划思路，提出以存量用地的更新利用来满足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需求；2015年，北京新一轮总规提出量化的概念，并明确人口与建设用地减量化与负增长，提出“由扩张型规划向城市边界限定、空间结构优化的规划转型”。同时，上海市与深圳市还颁布了保障存量规划实施的指导办法，诸如《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实施办法(试行)》、《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编制技术规定(试行)》、《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技术要求(试行)》等。

然而，目前已有文献更多聚焦存量规划理论探讨及中心城区的存量规划实践层面。理论探讨层面，认为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的转型是由于城市增长要素的变化(陈宏胜，等，2015)、土地利用模式的改变(邹兵，2015)等，其重点是处理复杂的既存利益格局调整问题(邹兵，2013)，核心是交易成本与制度设计(赵燕菁，2014)。总体规划实践层面，有学者(洪旗，等，2015)提出统筹存量、增量、减量建设用地的方向，也有学者(王磊，2015；方可，2016)系统探讨了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存量规划的实施路径及体制建议。详细规划实践层面，既有对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的方法、规划师角色转变的探讨(范丽君，2013)，也有对存量

¹作者简介

张振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规划研究室，城市规划师，whdxzzg@126.com

孙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副院长，高级城市规划师

马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规划研究室主任，城市规划师

时代下产业区转型更新规划的新理念与新方法的探讨(张蓓蓓, 等, 2016)。诸如此类, 在增量建设用地基本已经用完的城镇地区, 存量甚至减量规划成为探索的热点与重点。

对于以乡村为主导的郊区存量用地规划探索较少。上海正在探索的郊野单元规划, 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土地综合整治纳入到更新单元规划层级中, 实现城乡存量用地更新的规划全覆盖(刘俊, 2014)。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与资源约束的不断作用, 郊区用地规划将逐渐迎来转型与变革, 存量规划也将逐步被应用起来。存量规划重点在于如何发现并实现现有资产的潜在价值, 而大部分农村都是以存量状态存在, 怎样发现村庄价值并盘活村庄潜力, 就成为规划的主要内容(赵燕菁, 2016)。尤其对于上海这样的城镇化率高达 89%、建设用地占市域比重接近 50%的地区, 用地负增长不仅是中心城、城镇地区用地的负增长, 也是郊区城乡建设用地的负增长, 全域存量规划越来越成为关键词?因此, 本文基于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编制的实践, 探索生态型郊区由增量规划走向存量规划的原因、方向及策略。

2 生态型郊区存量规划的价值趋势

生态型郊区不同于城镇密集地区或产业大发展的一般郊区, 主要是指大城市周边的、以生态保育为主的郊区。这些地区既拥有资源禀赋较为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 又拥有布局分散且较大规模的乡村空间, 构成了全域发展的本底, 也支撑并孕育了生态型郊区的发展。

2.1 彰显郊区生态价值的思路正逐渐被认同

依托郊区构建绿色生态屏障成为特大城市新一轮规划的重要关注点。新一轮北京总规提出结合中心城周边公园绿地打造半小时休闲圈, 结合远郊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及周边跨界地区的国家公园等打造一小时休闲圈; 新一轮上海总规提出全域划定四类生态空间, 明确将一类、二类生态空间作为禁止建设区, 将三类生态空间作为限制建设区, 并依托郊区构建生态走廊、绿色通道系统、郊野公园体系, 奠定了郊区生态管控的基础空间。

2.2 转变生态型郊区大集中建设模式成为趋势

与中心城区集聚发展的趋势不同, 生态型郊区并不适合大集中建设的模式。一方面, 生态型郊区的集中开发地区往往受到交通等限制, 存在开发投入成本大、投资回收周期长等问题, 如崇明区城桥新城规划至 2020 年达到 20 万人, 但经过 2000 年至 2010 年的 10 年培育, 常住人口仅从 9.3 万增至 11.2 万人。另一方面, 生态型郊区工业发展动力受到较大限制, 尤其在生态发展导向下, 污染型企业面临清退与转型压力, 如崇明区 1995 年前乡镇企业蓬勃发展, 1980 年代小家电出口额甚至占上海市比重 50%左右(《崇明县志(1985-2004)》), 但 1995 年之后, (崇明 1996-2016 历版统计年鉴); 随着生态岛建设的标准不断提升, 全区从 1995 年至今累计关停企业月 1000 家, 工业就业亦减少一半。

2.3 生态型郊区广大乡村价值正逐步显现

长期以来, 生态型郊区农村价值被严重低估, 对应的以迁村并点与减量化为主的规划思路亟需转变。2002 年崇明提出推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集中居住; 2006 年, 崇明县自上而下提出向 208 个中心村集中, 但经历多年的实施, 自然村数量反而从 1999 年 5201 个增长到 2013 年 5920 个, 推动农村、农民向中心村集聚的设想几无可行。

事实上, 广大乡村地区见证了生态型郊区空间演变的历程, 也承载着一代代人不可磨灭的乡愁。乡村地区蕴含着巨大的生态与人文价值, 是践行城乡和谐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实现生态型郊区的农村价值, 不仅能拓宽农村的生存空间, 也是构建与大都市相匹配的美好乡村的必由之路。

目前，生态型郊区农村的价值在不断提升。随着生态、景观、文化等价值在城市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稀缺，农村正走出边缘化发展趋势。其一，城市居民对高品质、高安全性、个性化农产品需求不断增长，催生了郊区农产品向质量化转型之路。其二，长期被钢筋水泥和工作压力包围的城市居民更加渴望回归自然、向往绿色、追求传统，推动郊区农村向“生态+”等服务新经济转型。其三，随着涵养水源、净化环境、保护传统文化及生活、生产方式转型的迫切需求，推动农村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向不断转型。在此背景下，崇明诞生了政府主导投资的“前卫生态村”模式^①、同济大学探索的“桃花村试验”模式^②、本土知识分子返乡改造的“知谷1984”模式^③等诸多乡村改造模式，而推动着农村价值的进一步彰显。

由此可见，生态型郊区从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自身发展、空间优化的内在趋势。关键在于如何探寻生态型郊区存量规划的方向，并找寻适应生态郊区空间格局优化的策略。

3 生态型郊区存量规划方向探寻

3.1 空间布局强化全域协同性

生态型郊区空间规划不应只关注城镇空间，而应将关注视角投向全域。一方面，加强全域规划管控成为城乡总体规划的重要改革方向，将规划范围从中心城区扩大到全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中心城区规划范畴，强调城乡统筹发展，更加有利于中心城区与外围区县的协同发展。北京、上海、武汉等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都提出了全域管控的思路。另一方面，顺应生态型郊区建设空间“大分散”、生态空间“抹底色”的格局，突破发展唯城镇的局限，走向更全域的发展引导。韩国济州岛提出通过建设全域风景来提升岛域环境品质，并重点打造多元化的发展空间，包括以济州市及西归浦市为核心的城镇空间、以31洞为依托的广大乡村空间及以四大旅游集聚区为主导的类型多元的特色空间^④。

3.2 城镇空间强化规模适宜性

应顺应生态型郊区城镇集聚能力不强、建设空间散布的趋势，采取相对集中、适度分散的组团式布局模式。适宜生态型郊区的布局模式不应是大新城、大集聚、大开发型，而应是城镇空间不求集聚、而求与生态和谐共融型。兼顾城镇集聚发展与分散布局的需要，既要发挥城镇适度集聚的规模效应，又要避免集聚规模过大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冲击，因此，应探寻适合生态型郊区的建设空间集聚的合理规模，当建设规模超过片区集聚规模上限后，应跳出原有片区并在周边形成新的集中建设片区。济州岛城镇空间主要沿海分布，规模基本控制在1-5km²范围内，济州市与西归浦市的集聚规模较大，却分别形成了济州区、机场区、新济州区、阿罗都市区、三阳新区五大片区及西归浦市老区及西归浦市新区两大片区的组团分散格局，较好的保持了城镇空间合理的集聚规模。强化建设空间的适度分散格局，并不是绝对无序分散，而是组团化内疏密有序的相对分散，以避免城镇空间遍地无序开发格局。

3.3 乡村空间强化存量整治性

应转变对待乡村发展态度，走出迁并农村的传统思路，更加关注村庄自下而上的引导。一方面，应加强乡村空间整治，引导乡村地区存量更新。兰斯塔德绿心地区是推动乡村存量更新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土地整治、景观设计、设施配置、文化彰显、生态休憩五大举措，保护并完善了乡村空间。采取了相对稳定与微更新的思路，突出乡村用地的微更新，强化土地开发，提供广阔的农业空间，兼顾生态、游憩、居住、历史文化、景观品质的发展。另一方面，发挥村庄建设主体积极性，激发村庄内在发展活力。安吉统筹推进城乡规划建设，保持相关投入向农村倾斜，探索三种美丽乡村建设模式，一是点状模式，强化对村庄内部建设用地的环境整治和提升，二是线状模式，构建链接乡村构建美丽乡村与休闲产业示范带，三是面状模式，针对全域乡村空间构建“景区+度假区+乡村旅游”的县域大景区，通过多种模式协同推进，将公共服务延伸到农村各个角落，形成覆盖全域的公共服务网络。

4 崇明探索：从增量走向存量的范式转变

崇明总规经历了多轮探索与磨合，正不断寻求从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的转型之路。作为典型的生态型郊区，崇明生态本底资源丰厚，生态发展目标不断升级。目前面临着难以增量、拆乡村困难等问题^④，且未形成与生态建设相对应的规划路径，在生态文明彰显的背景下，亟需探索崇明新型规划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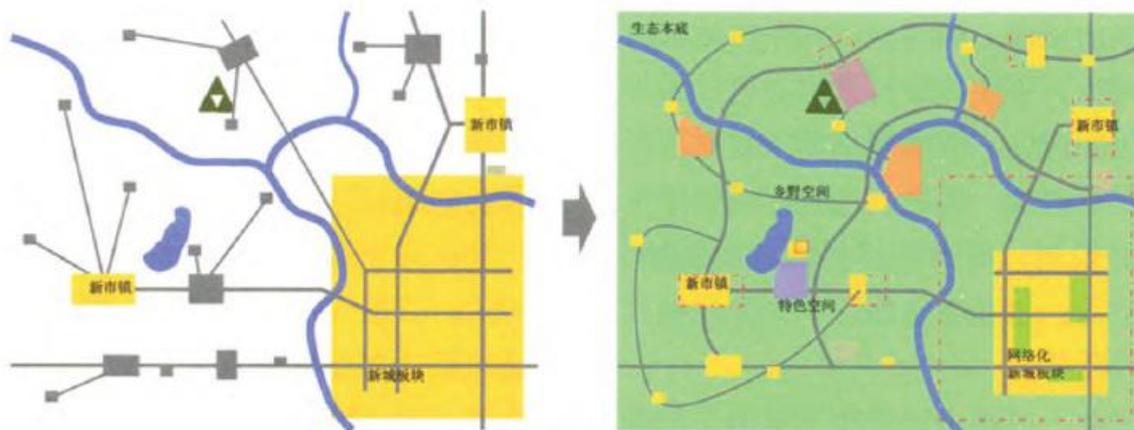


图1 从关注乡镇空间走向关注全域空间

Fig.1 From focusing on town/ township spaces to the regional territory

资料来源：崇明城乡总体规划纲要，2015。

表 1 2016 年济州岛各类空间载体梳理

	空间载体
城镇空间	济州市、西归浦市 翰林邑、涯月邑、旧左邑、朝天邑、大静邑、南元邑、城山邑 翰京面、楸子面、牛岛面、安德面、表善面
乡村空间	一徒 1 洞、一徒 2 洞、二徒 1 洞、二徒 2 洞、三徒 1 洞、三徒 2 洞、健人洞、老衡洞、道头洞、奉盖洞、三阳洞、我罗洞、莲洞、吾罗洞、外都洞、龙潭 1 洞、龙潭 2 洞、梨湖洞、禾北洞、松山洞、正房洞、中央洞、天地洞、孝敦洞、灵泉洞、东烘洞、西烘洞、大伦洞、大川洞、中文洞、晚来洞

特色空间	<p>17家马场（汉拿骑马场、成佛岳骑马场、梦矣骑马场、离于岛骑马场、松堂骑马场、奉盖观光骑马场、御乘 生骑马场、西广骑马场、草原骑马场等）</p> <p>28家高尔夫的运动空间（吾罗俱乐部、Zephyros 俱乐部、Ardenhill 俱乐部、愉快俱乐部、泰迪谷度假村、Haevichi 俱乐部、皇冠俱乐部、SaintFOUR 俱乐部、汉拿山俱乐部、吾罗乡村俱乐部、ShineVillePark 俱乐部等）</p> <p>22个主题公园（跑起来公园、骑马公园、济州恐龙公园、乱打秀济州剧场、济州 4.3 和平乐园、济州石文化 公园、济州迷你乐园、山君不离、济州艺术乐园、ECOLand 主题公园等）</p> <p>20个主题博物馆（海女博物馆、济州化石博物馆、Bike 博物馆、世界酒博物馆、静石航空馆、国立济州博物馆、申容电影博物馆等）</p> <p>28处综合度假区（西归浦自然休养林、雪绿茶园 Xamelliahill、Jumbo 住宅、龙头海岸、中文游览区、方林 园、神奇之路、沙罗峰公园、三阳黑沙海边、金宁海水浴场、城山日出峰等）</p>
------	---

资料来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ju_Island. 笔者整理绘制.

4.1 规划理念转变：从城镇增量规划走向城乡与生态全域统筹发展

崇明历版总规都是以强调为城镇预留充足增长空间的传统型总规，而对于乡村地区关注甚少。《崇明区域结构规划（2000-2020）》提出以城桥为重点、“新城-中心镇-一般镇”的三级城镇体系，《崇明三岛总体规划（2005-2020）》提出“一城九镇”的城镇空间格局，《崇明城乡总体规划（2010-2020）》提出加强城桥镇、陈家镇、长兴镇三大重点地区发展，扭转城桥单中心发展的局面。而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笔墨较少，主要涉及打造中心村、引导农民集中居住、明确规划期末农村居民点规模等内容。然而，这种以城镇增量为主的规划，既没有培育强大的新城、新区空间，也基本忽略了广大乡村地区发展的诉求。

因此，应跳出以城镇增量为主的规划思路、提出全域统筹发展成为本轮崇明总体规划走向存量发展的突破点。其一，转变生态被动保育、让位城镇建设的发展思路，率先划定生态底线空间，并将其作为城乡建设与发展的前置条件。其二，转变推动人口向新城、新区集聚发展的传统思路，压缩并腾挪城镇地区新增建设空间，既要关注有潜力、有动力地区的精明增长，也要关注空间规模过大、动力不足地区的合理收缩。其三，转变对待乡村地区减量拆并与集中安置的传统思路，更加关注存量宅基地的空间整治与有机更新，进一步结合资源、文化等打造特色村庄与特色地区，焕发乡村地区内在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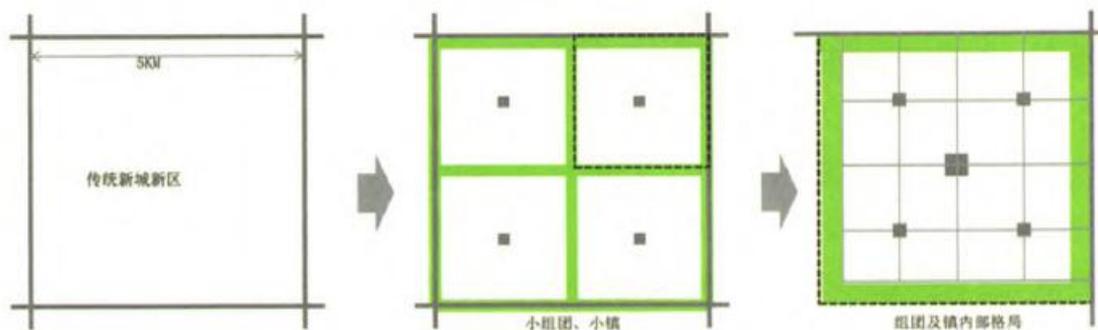


图2 开发模式转型示意

Fig.2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l

资料来源：崇明世界级生态岛规划建设导则（试行），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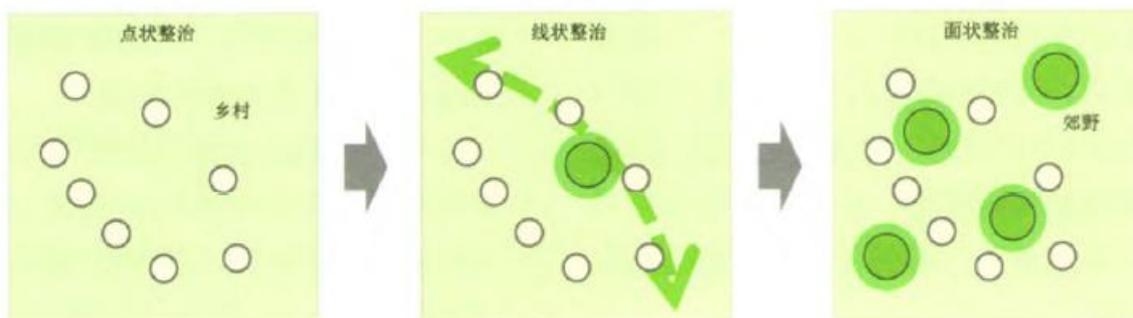


图3 安吉美丽乡村三种整治模式

Fig.3 Three remediation models of beautiful villages in Anji

资料来源：安吉开发区发展战略及总体城市设计，2016.

4.2 坚持生态为先：从被动保育走向主动框定存量规划的生态本底

转变对于生态被动保育的态度，明确划定生态底线，并在上海市总规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生态”扩大生态空间范围，以更加严格限定城乡建设空间及布局。一是“+生态底线”，最大限度的划定生态底线，对生态敏感地区与潜在的生态风险地区进行预先管控与防治；二是“+生态资源”，提高自然湿地保有率和森林覆盖率，完善生态资源系统，改造植被单一性，提高生物多样性；三是“+生态网络”，连通蓝绿空间体系。构建全岛生态环境建设框架；四是“+生态节点”，构建国家公园、郊野（区域）公园、城市公园、地区公园、社区公园多层次公园体系；五是“+生态修复”，从提升水质到塑造水生态、水景观，从土壤治理到植被恢复和地表景观优化。

在生态保护基础上，积极探索生态地区价值彰显路径。以耕地质量不降低为前提，积极引导耕地向生态保育、景观休闲、文化教育等多元方向转变，推动耕地利用走向“量质并重”和“用养结合”，全面提升耕地的综合利用效益。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融合生态自然优势与生态发展优势，提升生态环境品质，提高生态人居水平，提升生态发展能级。

4.3 优化城镇边界：从增量为主走向合理明确城镇存量及增减空间

优化城市开发边界，大力压缩城镇新增建设空间。一方面，加强总量管控，对城市开发边界进行整体瘦身，全区城市开发边界由现行规划 157km² 压缩至 133km²，城市开发边界内新增建设用地空间同步由 53km² 压缩至 36km²；重点压缩开发边界过大、发展动力不足的城镇地区开发边界，城桥、陈家镇两大重点地区压缩开发边界近 21km²。

加强城镇建设空间腾挪，合理明确城镇新增空间布局。其一，结合城镇地区布局市区级重要战略功能板块，如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生态科研高教区、城桥高铁枢纽等高端服务类功能，以及长兴产业基地等高端制造类功能。其二，识别“生态+”新经济空间，结合西沙景区、东平森林公园、东滩等核心资源，预留创新、休闲、文化、健康等多元新经济空间，进而形成绿华小镇、西沙小镇、滨江小镇、健康小镇等特色小镇空间。其三，预留民生服务设施供给空间，重点依托城桥、堡镇等传统型城镇地区，预留未来城镇化需要的居住、服务、公园等空间，保障本地居民多元化的选择通道。

优化全域城镇空间，塑造紧凑集约的城镇格局。以组团分布、有机生长为导向，调整乡镇单元开发模式，由传统的“新城、新区”转变为“小镇、小组团”，降低建设空间对生态的干扰；缩减城镇空间尺度，由传统的 5x5km 的大板块调整为 2x2km 的小单元，通过城市绿楔、滨水廊道、公园绿地消解过度集中的空间发展板块，实现森林环城、城景交融。加强城镇功能复合发展，统筹构建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4.4 乡村存量更新：从拆农村走向探索乡村整治与提升的多元方向

挖掘乡村存量空间特色，塑造有机舒朗的乡村格局。促进乡村地区存量活化，彰显崇明生态岛乡村发展特色。转变乡村大力减量思路，重点依托现有乡村挖掘，构建水宅相依、绿树延绵、农田万顷的崇明图景。遴选并打造特色村庄，以试点推动乡村示范，采用针灸式整治的方式，遴选有基础、有特色、有能人的村落来进行乡村复兴建设的探索。保护与控制河道水渠、森林树木、田园肌理、乡村道路、建筑村落等五类要素，力求实现环境提升、功能提升、风貌提升和服务提升。

活化更新乡村空间，彰显文化魅力与生态价值。以功能植入谋划乡村转型，鼓励旅游、创意、艺术、农业、教育、市集等多元化功能的培育，从而在乡村和田野孕育出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以设计融入提升乡村价值，积极学习日本、台湾及其它国内先行地区的经验，结合风景和田园，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和少量新增建设用地打造特色庄园，保障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产业配套设施落地。

加强乡村环境整治，优化提升风貌格局，促进乡村环境生态化。选择资源特色相近、空间距离接近的多个特色村庄联合发展，打造主题各异特色村区。整体提升特色村区环境风貌，基于崇明乡村东西沿河拓展、南北沿路连接的特征，沿水渠两侧优化公共空间，沿南北增加连通道路。推进乡村风貌本土化，鼓励设计师与村集体和本地村民合作，开展扎实、深入、落地的本土建筑改造、景观营造和风貌提升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最大化地发挥存量宅基地和闲置地的价值。

5 延伸探讨

生态型郊区存量规划并不一定存在范式，每个郊区解决的问题不同，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以套用。但是总体而言，有一些共性的方向值得借鉴。一是城镇地区加强精明增长与合理收缩，推动城镇空间的有机生长与紧凑布局。二是乡村地区加强存量更新，强拆、安置不是可取的道路，应探索整治、提升、改造、活化的多元路径。三是生态地区不能被动保育，应顺应生态文明新趋势，明确生态底线管控要求，适度进行“+生态”与“生态+”，探寻多元化生态导控方向。此外，生态型郊区存量规划的关键，是转变对于城镇地区以外的广大乡村的态度，应探索自下而上的改造与自上而下的规划之间有效互动的路径。

注释：

①“前卫生态村”模式，是由多级政府投资、村集体实施管理，鼓励引导农户开展农家乐等乡村旅游活动。

②“桃花村试验”模式，是同济学者结合仙桥村老旧村舍及大棚改造，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田园的乡土情节有机融合，并形成文化创意工作坊和文化秀场。

③“知谷1984”模式，是通过普通村舍进行整体翻修，既保持村舍的特有风貌，又融入城市住宅的现代性，体现出浓浓的乡愁，吸引城里小资青年来此度假聚会，迎合城市居民忆往追惜的情怀。

④现状格局大分散与规划引导大集中的矛盾，镇不断扩张与乡村减量困难的矛盾，生态持续保育与产业发展受限的矛盾。

⑤<http://emap.visitkorea.or.kr/Scripts/EngMap.aspx>.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ANDERSON G, TRECONING H. Smart growth in our future smart growth[M].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Land Institute, 1998.

[2]陈宏胜,王兴平,国子健.规划的流变对增量规划、存量规划、减量规划的思考[J].现代城市研究,2015(9):44-48. (CHEN Hongsheng, WANG Xingping, GUO Zijian.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urban planning: thoughts on increment planning, inventory planning and reduction planning[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5(9): 44-48.)

[3]方可.对特大城市存量规划编制模式创新的思考——以武汉市为例[C].//规划60年:成就与挑战——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16. (FANG Ke. Reflections on the mode innovation of the planning planning of the large city: take Wuhan as an example[C].// Planning for 60 year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2016 China Urban Planning Annu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2016.)

[4]洪旗,郑金,陈华飞.基于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发展规划探索与实践——“规土融合”思路下存量规划[J].现代城市研究,2015(5):15-22. (HONG Qi, ZHENG Jin, CHEN Huafei. The pathway and practice of spat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based on intensive use of land: a case study on stock plan with the idea of the “Fusion of Land Use and Urban Planning” [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5(5): 15-22.)

[5]刘俊.上海市郊野单元规划实践——以松江区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2014(1):66-69. (LIU Jun. Planning practice of suburban units in Shanghai: a case study of suburban unit Planning in Xinba Town, Songjiang District[J]. Shanghai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4(1): 66-69.)

[6]施卫良,等.面对存量与减量的总体规划[J].城市规划,2014(11):16-22. (SHI Wei-liang, et al. Master plan at targeted at stock and decirement[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4(11): 16-22.)

[7]王磊,陈昌勇,谭宇文.存量型规划的建设用地再开发综合评定与空间管制——以《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为例[J].规划师,2015(8):60-65. (WANG Lei, CHEN Changyong, TAN Yuwen. Redevelopment dvaluation and space governance in built-up area planning: foshan master plan case [J]. Planners, 2015(8): 60-65.)

[8]范丽君.深圳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实践探索与思考[J].城市时代,协同规划——201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J].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 (FAN Lijun. The explor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practice on Shenzhen urban renewal unit planning[J]. City Era and Coordinated Planning 2013 China urban planning annu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11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Urban Renewal)

[9]赵燕菁.乡村的存量规划(1).海峡旅游,2016(1). (ZHAO Yanjing. Inventory planning of Village[J]. Strait Tourism, 2016(1).)

[10]赵燕菁.存量规划:理论与实践[D].北京规划建设,2014(4):153-156. (ZHAO Yanjing. Inventory planning: theory and pntice[D]. Beijing Planning Review, 2014(4): 153-156.)

[11]张蓓蓉,等.“存量时代”产业区转型更新规划探索——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2016(4):120-124. (ZHANG Beirong. Exploration on the renewal planning of industrial zone in the stock time: taking China (Shanghai) free trade experimental zone as an example [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6(4): 120-124.)

[12]邹兵.增量规划、存量规划与政策规划[J].城市规划,2013(2):35-55. (ZOU Bing. Increment planning, inventory planning and policy planning[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3(2): 35-55.)

[13] 邹兵. 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 理论解析与实践应对[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5): 12—19. (ZOU B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greenfield based planning to redevelopment plann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5(5): 12-19.)